

【域外走笔】

平静地看美国

□宋遂良

近年来,我几次去美国探亲,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在那里有在国内难得的清闲安静,于是也就有机会不带成见地感受一下美国。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我觉得观察美国时,把美国的人民和政府适当地分开来看比较好。

美国得天独厚,“上帝眷顾阿美利加”。美国建国 200 多年,也就是在我们的乾隆年间才建国,没有历史包袱,少有封建传统;有着和我国类似的幅员疆土,但人口却只有我国的四分之一,且没有像我国西北西南那样的不毛之地。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州,连疆域划界都是横平竖直,没有一丝曲里拐弯。首都华盛顿是世界上唯一按图纸建设的城市。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五角大楼,竟然不在市区而到了弗吉尼亚州。美国以其辽阔和富裕的体质、宽容开放的心态,不拘一格地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奥巴马今年提出要把 1100 万非法移民改为合法身份,去年一次就把 80 万非法移民的子女转成美国籍。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每期都刊有各类华人申请移民的时间表。美国到处有荒芜待卖的土地,有成片的原始森林,仅华盛顿地区就有 300 处公园。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中央公园,占地 3.41 平方公里,里面有森林、湖泊、牧场、运动场、美术馆……四通八达。在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样空旷休闲的所在,令人惊异。这些先天的资质,其他国家只能羡慕。

来美之前听说美国人不关心政治。当时以为大概他们都是只管自己,没有历史悠久的中国人那么爱国。来后看一看,想一想,觉得自己错了。美国人其实是很爱国的,很多居民的门口常年都飘着美国国旗。你若是有机会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去看一看,瞻仰者面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坪上矗立的白色石碑和十字架表现出来的虔诚静穆,就能感受到其人民的爱国热情。

爱国和关心政治是两码事。一个国家关心政治的人太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每个球迷都当教练,这球就没法踢了。因为政治是很复杂、很深刻的。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应对国防,还有外交、经济、民生等许多问题,需要很多专家,需要智库、研究室等各种专门机构集思广益,要有历史经验、决策艺术,要讲时机、策略,未雨绸缪或亡羊补牢,多方比较,考量可能的后果,有时又要当场拍板,乾纲独断,容不得半点犹豫……举棋不定,感情用事,七嘴八舌,坐而论道,争论不休,只能添乱误国。

我们过去总是把民意和公众舆论看得很高(台湾现在尤其如此),其实,来自公众的声音往往带有个人的局限。它以利益和成见为基础,受时尚裹挟,有相当多的想当然和情绪化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有时也只图一时痛快发泄,事后对所讲过的话、下过的结论很快又忘记了,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常常是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批评议论者早已时过境迁了,当事人却还留下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美国人只是每四年投一次票选出自己喜欢的总统就完成任务,剩下的政治就信任政府的能力和众、参两院以及舆论的监督职能,由他们去管理而不去“关心”了。这很像中国的那句古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一种好的制度与风气,节省了很多社会资源,提高了很多办事效率。我觉得中国也在逐步向这个方面改变,前提条件是要提高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这是我这个老爱国主义者的一点新希望吧。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窥海斋】

莫言爷爷讲的故事和我爷爷讲的故事

□林少华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

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奖演讲《讲故事的人》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最后讲的是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说,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让我们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的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条船在湖里航行时,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

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舞台,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上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做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用毛笔字歪歪扭扭写着“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位县一中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打倒我爷爷,大家就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吧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不了了之,除了被勒

令去公社所在地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于 1993 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不妨说,爷爷至死都未能将他对我讲的“壶·手·盅”(胡守忠)故事同“文革”联系起来。至少,这对“文革”是幸运的。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中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

顺便说一句,我的爷爷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此前我从未讲过。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